



“学术新视野”丛书

《东方杂志》与现代中国文学

王勇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学术新视野”丛书

《东方杂志》与现代中国文学

王勇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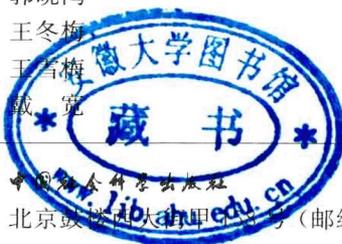
《东方杂志》与现代中国文学/王勇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4

ISBN 978-7-5161-3569-3

I. ①东… II. ①王… III. ①期刊—研究—中国—民国
IV. ①G239.2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65748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王冬梅
责任校对 王雪梅
责任印制 戴宽



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浪屿大街甲 1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0.25
插 页 2
字 数 333 千字
定 价 5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东方杂志》研究的新拓展

《〈东方杂志〉与现代中国文学》是王勇在南开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的论文，经过一年多的修改，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写序的事情随之提上议程。本想请张俊才先生担当此任，一来张先生是王勇的硕士生导师，对他有培育之恩，二来张先生是国内著名的林纾研究专家，对这一研究领域比我了解得更深入，是为此书作序的最为合适的人选，但先生坚辞，只好由我来写这篇序了。

王勇是我在河北师范大学工作时的同事，也是多年的朋友。考博士时，他已经在大学工作了十几年，也算是个“老教师”了，但他不安于现状，想在学术上再进一步，打定主意要继续深造。2008年，他考入南开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成为我的学生，因此，我们可以说是亦师亦友的关系。入学以后，我们曾就博士论文选题做过多次交流，他自己感觉对理论不太擅长，但愿意多下工夫。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他在读博期间多读些理论书籍，同时适当留意一些比较有影响的综合性杂志。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诸多文学报刊已经有人做过专门而深入的研究，可供开拓的空间不大。而综合性杂志虽然不是专门的文学刊物，但这些刊物往往长期开设文学栏目；同时，在思想、政治、历史诸方面对中国近现代文化又产生过重要影响。当时，文学研究界对这类杂志还少有总体性的关注，我们相信，只要以问题为中心，深挖材料，是可以做出一篇好论文来的。按照这一思路，王勇开始关注《东方杂志》，虽然有许多学者对这个杂志做过深入研究，但其关注点多是《东方杂志》在思想、法律、教育、传播等方面的内容，而其中丰富的文学世界及思想与文学的互动关系则少有人问津，还留有较大的学术空间。最终，王勇选定了“《东方杂志》与现代中国文学的发生”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

从此，王勇一头扎进了《东方杂志》中，经过四年的艰苦努力，克服了种种困难，数易其稿，终于完成了博士论文《〈东方杂志〉与现代中国文学的发生》，并顺利通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王勇继续深入自己的思考，经过近一年的修改，最终成稿。在我看来，王勇博士论文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在总体上讨论了《东方杂志》与现代中国文学发生、发展的关系，填补了文学研究中的一项空白。从外审专家的评审意见来看，王勇的博士论文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选题新颖，具有开创性。一个好的博士论文选题，首先要有学术价值，要能够为学术界增添和补充新的东西。论文的外审专家也都充分肯定了论文的创新性以及它的学术价值：“论文以商务印书馆刊行的《东方杂志》为研究对象，探讨该杂志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关系，选题和研究角度均富有创新意义”；“论文针对以往研究的薄弱之处即《东方杂志》的文学世界展开自己的研究，有较强的学术针对性”；“本文对《东方杂志》与现代中国文学的发生之关系，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选题新颖而有开创性”；“论文所揭示的《东方杂志》文学世界及相关学术结论对于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是富有学科建设性的”。可见，王勇博士论文的创新性和开拓性得到了学界的认可。

第二，从发生学切入选题，研究角度科学有效。《东方杂志》横跨近现代中国历史，从1904年创刊到1948年终刊，前后有四十多年的历史，但《东方杂志》最有成就、最有影响的时代应该是在五四前后，即中国新文学发生发展的重要时期。因此，从新文学发生的角度来展开对《东方杂志》文学世界的考察，就有了很好的切入点，并且使这一研究逻辑更为严密，更为科学。所以，论文第三章对《东方杂志》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考察是本书的亮点之一，讨论尤为深入，对《东方杂志》与新文化思潮、白话文运动的互动关系的研究颇多创见，深化了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他的《〈东方杂志〉与白话文运动》一文公开发表后，又被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全文复印，由此可见，他的研究还是有些独到之处的。

第三，学术视野比较开阔，有较强的历史感。文化研究需要作者有开阔的学术视野，在研究《东方杂志》时，王勇没有就文学而谈文学，而是将研究对象纳入到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进程之中，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坐标

上，在期刊与社会、编辑与作者、文学创作与翻译、批评的互动关系中考察现代文学发生、发展、演变的轨迹，探究《东方杂志》对中国近现代文学的作家群体、文体建构、文学生态等方面的贡献。这一点也得到了许多专家的肯定：“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和文学的关系中论述问题，具有历史感，既有问题意识，又有具体现象、特征的分析论证”，“论文从一个较为开阔的视野考察《东方杂志》的诞生、发展及其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以及其翻译、文学创作对中国现代文学发生所发挥的功能，思路清晰，资料翔实，分析细腻，论证可靠”。

第四，严谨扎实的学风和厚实凝重的学术分量。期刊研究需要作者能够沉下心来，钻进古旧的期刊之中，需要作者有严谨扎实的学风。《东方杂志》发行近半个世纪，有44卷，800多期，每期近20万字，光是阅读这些杂志，就是非常浩繁的工程。没有相当的毅力，没有吃苦的精神，没有严谨扎实的学术态度，就不可能完成这项工作。而王勇克服了相当多的困难，不仅翻阅了全部的《东方杂志》，而且在规定的时间内顺利完成了论文，早早地把论文交到我手里。后又经过多次修改，最终形成26万字的论文，厚厚的一本，凝聚着他对《东方杂志》与中国现代文学的深入思考。由于前人没有对《东方杂志》中的文学资料进行过研究，所以对《东方杂志》中的文学资料进行梳理是研究工作中必不可少的一环。这是一件非常繁琐的事情，王勇花费了大量的时间，运用数理统计的方法对《东方杂志》上的文学资料做了归类整理，列出了详细的图表，对《东方杂志》中发表的文学作品、文学翻译、作者情况等也都做了非常细致的统计。他的这种努力也被评阅论文的专家们看在眼里：论文“体现出严谨扎实的学风和厚实凝重的学术分量”，“论文对《东方杂志》及其相关史料的研读，梳理细致有力，从中提炼的问题对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颇有价值”，“论文对《东方杂志》上的文学进行了一次较为全面的梳理、排察，对其中的文学现象进行较为系统的分类、分析。论文在资料的整理、使用上非常扎实，尤其是实证性方法的使用以及大量的数据统计，使论文观点具有很强的论证性”、“材料翔实，体现了严谨的学术态度”。

正是基于以上因素，王勇的论文受到了外审专家的肯定，“这是一篇优秀的富有学术价值的博士论文”，“论文所揭示的《东方杂志》文学世界及相关学术结论对于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是富有学科建设性的”，

“其研究成果对《东方杂志》的研究有拓展意义”。

当然，任何一篇论文都不可能是完美的，王勇的论文也是如此。表面看来，这一选题研究的只是一个杂志，似乎不算大，但如果做好这个课题，却需要对中国现代史、思想史有着较为深入的了解，而如果将《东方杂志》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考察清楚，又需要对现代作家与这一杂志的关系梳理清楚，这又需要研究者从大量的作家日记、书信、回忆录中寻找线索……要想在两三年的时间内把这些问题解决，非常之难。王勇虽然在这方面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但受制于时间，有些地方依然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正像评审专家所指出的：“问题都已铺开，编辑、创作、翻译、批评等都已涉及，各自提出的问题也有其价值，但问题的论述确有可深化之处，各章的展开基本上服从于作者已有的观念，尤其是对《东方杂志》文学世界的既有看法。所以从《东方杂志》自身发现、提炼更有历史性的问题，从历史‘点’中更多地感悟历史全局尚可努力。材料运用上的重点也可作进一步考虑，以在‘发生’的揭示上更有力。”好在《东方杂志》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已经逐渐引起了学界的重视，连续两年有学者以此为题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我相信，专家们的意见肯定会引导王勇对《东方杂志》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写出更多富有说服力的论著来。

为自己的学生的书写序，似乎是导师应尽的义务，但往往也会存在一些赞美之辞。这不仅是由于师生之间的亲情，也受制于导师自己的学术视野。因此，写这篇序时，我自己也颇为踌躇，最终采用了以外审专家的评语为主线，连缀成篇的形式，写成此序。

王勇的第一本学术专著即将出版，希望他能以此为新起点，在以后的学术道路上更勤奋、更踏实，取得更大的学术成就。

李锡龙于南开大学范孙楼

2013年5月10日

目 录

《东方杂志》研究的新拓展	(1)
绪论	(1)
第一章 《东方杂志》:商务印书馆的期刊重镇	(9)
第一节 商务印书馆:从印刷小作坊到现代传媒集团	(9)
第二节 危机中诞生的《东方杂志》	(19)
第三节 《东方杂志》的生命轨迹	(23)
第二章 编辑与《东方杂志》的文学面貌	(33)
第一节 孟森杜亚泉时代的文学面貌	(34)
第二节 钱智修胡愈之时代的文学面貌	(41)
第三节 李圣五及以后时代的文学面貌	(63)
第三章 《东方杂志》与新文化运动	(73)
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先导	(74)
第二节 调和:新文化的另一种选择	(85)
第三节 “为新文化植深厚之基础”	(107)
第四节 《东方杂志》与白话文运动	(120)
第四章 《东方杂志》的文学翻译	(133)
第一节 《东方杂志》的文学翻译概况	(134)
第二节 俄国文学:中国新文学的目标	(145)
第三节 泰戈尔:新文学的启示录	(166)
第四节 “做综合地研究”:《东方杂志》的译介导向	(173)

第五节 榜样的力量:《爱的教育》与《大地》	(190)
第五章 《东方杂志》的文学创作与批评	(209)
第一节 中国新文学创作的重要阵地	(210)
第二节 《东方杂志》与现代文学流派	(235)
第三节 文学批评:新文学的引导者和守护神	(276)
结语	(301)
参考文献	(307)
后记	(313)

绪 论

—

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中国文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转型期，在文化和传媒研究以及文学社会学的带动与影响下，文学研究由内部向外部转移，期刊研究成为学术界新的增长点。

期刊作为一种传播媒介，不仅是文学和文化的载体，也是作者与读者沟通的桥梁；不仅是编者的编辑意图、文化观念与市场交汇的产物，也是作家汇集、流派生成的纽带；不仅是传播知识、思想交锋、文艺论争的主要阵地，也是政治力量、文化权力的竞技场。因此，期刊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现代中国文学的原生态风景，也为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提供了取之不竭的资源与材料。如果说内部研究是把文学局限于自身狭小封闭的空间里，那么期刊研究则把文学拉到了开放繁杂的十字街头，让人顿生空间阔大和目不暇接的感觉，现代中国文学的研究空间也因之得以扩展，并获得新的生机。在一定程度上，期刊研究的出现是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重大转型，它不仅意味着文学观念的改变（文学不仅仅是文本，还包括文学生产、流通、传播等），也意味着研究路向和方法的转换以及固有研究疆域的突破，同时，期刊研究的结果也不断地改变着以往文学史的既成结论，为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带来了无限风光和活力。

近年来期刊研究的丰硕成果正是这种风光和活力的体现。期刊研究论文数以百计，它们或对某一时段的期刊进行整体性扫描，或对某一期刊做总体性观照，或对期刊的刊行面貌、文化身份、历史地位进行考察，或从期刊与流派的关系中进行研究，或从编辑与刊物的双向建构中考察刊物，或聚焦式地研究期刊的某一栏目、某一文体，或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研究文

学与期刊的关系。我们可以从中国知网上检索到几十篇关于期刊研究的硕博学位论文，由此可知期刊研究的热度。

在这股期刊研究热潮中，一些具有重要影响的报刊成为关注的焦点，有的甚至被多次研究过，如《小说月报》、《大公报》、《现代》、《晨报副刊》、《新青年》、《新月》、《抗战文艺》、《学衡》等，这些期刊负载了现代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文本部分，研究它们对于还原现代文学的生存空间，挖掘沉落的文学史料，勾勒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脉络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东方杂志》作为一份在全国有重要影响的期刊，同样得到了研究界的重视，出现了大量的硕博学位论文，但目前我们看到的有关《东方杂志》的文章，多是从思想史、传播史、法律史、经济史、教育史等角度对该杂志进行研究，而对《东方杂志》文学世界的关注相对薄弱，特别是在博士论文中几乎是空白。

《东方杂志》是商务印书馆刊行的一份非常重要的期刊，1904年3月创刊，到1948年年底终刊，前后持续45年，共出44卷，818期，813册。它几乎贯通了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是这一时段中国社会发展变革的一个见证和缩影。作为一个综合性刊物，其中的文学栏和附载的文学作品也伴随着该杂志走过了四十多年的历程。据统计，该杂志上发表的文学作品总数有近千部，单是属于原创性的作品也有500多篇（不算旧体诗词），涉及小说、剧本、散文、诗歌、杂文、游记等多种文体，同时还有大量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文章。就作品的数量和规模而言，《东方杂志》绝不亚于一般的文艺期刊。就其文学世界的丰富性而言，它有中国近现代文学的资料宝库之称，有学者评价说：“据粗略统计，《东方杂志》由创刊到终刊（1904—1948）45年（出刊44卷）的过程中，先后约三百位不同政治倾向、不同文学流派的近现代作家在该刊发表过创作或论文。这是中国三代作家先后走上文坛的一个共同的创作平台。”^①因此，我们毫不夸张地说，一个《东方杂志》构成了一部中国近现代文学发展史，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发展的一个见证和缩影。但就是这样一个对于中国近现代文学非常重

^① 刘增杰：《文化期刊中的文学世界——从现代文学史科学的视点解读〈东方杂志〉》，《汉语言文学研究》2010年第1卷第1期。

要的期刊，可能因为它的综合性质和庞杂的内容，而让人忽视了它的文学价值。

鉴于以上情况，本书首先是拓宽文学研究的领域，丰富现代中国文学的内容。《东方杂志》的文学世界到底是什么状况，有多少翻译和创作作品，有哪些文学批评文章，这在以前的研究中是非常薄弱的。因此，对《东方杂志》的文学世界进行梳理和统计，将《东方杂志》丰富的文学世界呈现出来，是本书的研究内容之一。其次，进一步挖掘综合性期刊对现代中国文学的贡献。学术界对综合性期刊的文学研究已经有很多成果了，但对《东方杂志》的文学研究还是个空缺，本书正是要通过对《东方杂志》上所刊载的文学作品及有关文学内容的考察，揭示出《东方杂志》作为一个综合性的传播媒体之于现代中国文学的发生发展、文学流变以及多元文学形态建构等方面的重要价值，以弥补《东方杂志》研究中文学研究的不足，同时也让更多的人因此而认识到综合性期刊对于现代中国文学发展所起到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一

以《东方杂志》为题的研究，学术界已经涌现出了一些重要成果。就博士论文而言，目前可以查找到的有五篇：一篇是台湾黄良吉的博士论文《〈东方杂志〉之刊行及其影响》（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年版），一篇为洪九来的《宽容与理性——〈东方杂志〉的公共舆论研究（1904—1932）》（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一篇为丁文的《选报时期的〈东方杂志〉研究（1904—1908）》（北京大学2007年，该文已由商务印书馆2010年出版），一篇为王代莉的《五四时期的文化调和论——以杜亚泉和〈东方杂志〉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2009年），杨霞的《初期现代汉语新词语研究——以〈东方杂志〉（1911—1921）为语料》（河北大学2011年）。另外，杨萌芽的《清末民初宋诗派文人群体研究》也有一章内容涉及《东方杂志》。

黄良吉的著作共分为九章：第一章：《东方杂志》的诞生；第二章：《东方杂志》的历任主编；第三章：停刊与复刊的原因及经过；第四章：刊期的回顾与探讨；第五章：清末《东方杂志》对于外交立宪的主张；第六章：民初《东方杂志》的贡献；第七章：五卅事件临时增刊；第八章：

从“五卅”到“九·一八”；第九章：从“一·二八”到抗战胜利。由于此文写作时间较早，再加上资料有限，所以只是初步梳理了《东方杂志》的发行轨迹及出版情况，确立了《东方杂志》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及影响。该文对于杂志刊行情况的考察较为详细，对于刊物的创办、停刊、复刊、卷期、专号等的考辨尤其值得称赞。作者在结论中将《东方杂志》对国家民族的贡献概括为“专业精神”、“新闻自由的争取”、“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一切”、“永久站在知识领域的前线”、“重视国际局势的发展”五个方面。该文注重史料的梳理和文献的考证，但学理上的辨析不足，视野不够开阔，对杂志中的文学部分根本没有涉及。尽管如此，作为研究《东方杂志》的第一篇专业论文，其对于《东方杂志》研究的奠基之功不可低估，洪九来评价它“是第一部从传播学角度对《东方》进行整体研究的专著”，“对《东方》的研究工作有前驱之功”^①。

洪九来的《宽容与理性》是一篇非常有理论深度和宏阔视野的论文。全书共分十章：导论：《东方杂志》的“守门人”：类型与意义；第一章：时代变迁与话语转换；第二章：苦心经营的“公共领域”；第三章：政治秩序转换中的理性主义；第四章：社会变革进程中的渐进主义；第五章：纳入世界格局的民族主义；第六章：中西文化冲突中的调和主义；第七章：新旧文学嬗递中的现实主义；第八章：古今学术流变中的进步主义；结语：《东方杂志》知识分子群体在转型社会中的地位及其困境。从章节上来看，文章对《东方杂志》的多个方面都进行了讨论，并归纳出了自己的观点。作者引入了“守门人”、“公共领域”、“知识分子群体”等理论概念，对《东方杂志》做了非常深入的研究，所得结论也较为令人信服。此文是中国内地第一篇关于《东方杂志》的博士论文，把《东方杂志》研究推到了一个新高度。按作者所说，该论文答辩时并没有关于文学的一章，只是到了后来出书时才补上的。仅就文学一章而言，作者的分析很有见地，指出了改版后的《东方杂志》，“作为一个综合性的期刊，《东方》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的文学栏目以其巨大的分量与精美的质量赢得了社会与读者的认同，其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并不逊于同时期一些

^① 洪九来：《宽容与理性——〈东方杂志〉的公共舆论研究（1904—1932）》，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或短促、或平庸的文学专刊。”^① 这一点为后人研究《东方杂志》指明了路径，即可以将《东方杂志》里的文学作为一个专题来进行深入研究。由于作者对《东方杂志》的考察仅限于1904—1932年，更由于作者历史学专业的身份以及其研究重心并不在于文学，所以文学一章没有能够全面而深入地展开，但他关于文学的叙述却对后来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丁文的博士论文《选报时期的〈东方杂志〉研究（1904—1908）》同样是一篇非常精彩和有分量的论文，她从新闻传播学的角度对选报时期的《东方杂志》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作者通过对《东方杂志》选报体例的挖掘，深入探讨了该杂志在建构自己的言论体系方面所作的别有意味的选择及努力。作者选择的时段虽只有四年（1904—1908），但题小旨深，理论深度和思辨能力超乎寻常。这篇博士论文由于着眼于传播学，且对其中的非文学文本更感兴趣，也由于此时期的文学在《东方杂志》上只是一个陪衬与附庸，所以没有把文学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

王代莉的《五四时期的文化调和论——以杜亚泉和〈东方杂志〉为中心的考察》，聚焦五四时期的文化调和论，对这种思想的国内国际背景、代表人物及言说阵地、理论基础和思想内涵、中外的思想来源、文化实践和建设理念以及调和论的理论与实践缺陷等做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言说有据，论辩清晰。可惜作者是研究近代文化史的，对文学没有任何涉及。

杨霞的《初期现代汉语新词语研究——以〈东方杂志〉（1911—1920）为语料》是以《东方杂志》的文本为语料，从语言学角度对初期现代汉语的新词语进行研究，不涉及文学内容。

杨萌芽的《清末民初宋诗派文人群体研究》，从社团史的角度来考察1895—1921年间的宋诗派文人群体，以这一群体的人事与文学活动为研究对象，全文共分六章。其中的第五章探讨了宋诗派文人群体与现代期刊的关系，该章第二节分析了1915—1920年间的《东方杂志》与宋诗派的密切关系。作者通过宋诗派文人与商务印书馆的密切关系，揭示出宋诗派文人如何占据与利用《东方杂志》这一重要的现代媒体资源，从而使《东方杂

^① 洪九来：《宽容与理性——〈东方杂志〉的公共舆论研究（1904—1932）》，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09页。

志》为传统文学的尾声——宋诗派文人提供了长达五年的生存空间。由于作者关注的是宋诗派的古诗文，所以对古诗文之外的文学文本以及新文学内容没有涉及。

关于《东方杂志》的期刊论文在中国知网上可以检索到几百篇，但真正谈到文学的只有一篇，那就是杨萌芽的《〈东方杂志〉与清初宋诗派文人群》（《复旦学报》2007年第5期），这是其博士论文的一部分，前文已有评述，不再重复。

关于研究《东方杂志》的硕士论文，截至2009年，我们可以从中国知网上检索到二十多篇，它们或谈西学传播，或谈清末的政治改革，或谈宪政思想，或谈妇女问题，或谈教育问题，或谈启蒙问题，或谈第一次世界大战，或谈民族主义，或谈与五四运动的关系，或谈编者与杂志的关系，等等，这类非文学研究的论文占了绝大多数。其中只有三篇是关于《东方杂志》文学方面的研究：一是《对〈东方杂志〉中美学文本的整理与研究》（孙振，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二是《1904—1927：〈东方杂志〉翻译文学研究》（章琼，四川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三是《〈东方杂志〉中的杂文创作研究》（孟晓艳，辽宁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

《对〈东方杂志〉中美学文本的整理与研究》这篇论文运用统计学和考据学的方法，对《东方杂志》上发表的有关美学文本做了数量上的统计和类别上的归类，选题应该说是很好的，但作者做得不够深入，仅停留在归类分析与解说的层面上。《1904—1927：〈东方杂志〉翻译文学研究》是一篇做得非常扎实的论文，作者对《东方杂志》1904—1927年间的翻译文学做了定点研究，特别是文章的第三章，对改版后的《东方杂志》对外国文学译介的特点及方式做了细致的归纳与分析，又以对俄国文学的译介为例证做了较为深入的分析。通过论文后面的附录，可以看到作者在运用统计方法进行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其研究的精神和踏实的学风令人敬佩。由于是硕士论文，也由于论题及考察年限所限，作者没有对原创文学和文学批评做更多的涉及，更不可能对《东方杂志》的文学全貌做整体考察。《〈东方杂志〉中的杂文创作研究》从文体角度入手，对《东方杂志》上的杂文创作概况、思想倾向、艺术特色，以及从杂文创作中看到的《东方杂志》的编辑方针进行了梳理和考察，具有一定的深度。但此文所界定

的杂文概念过于宽泛，就其所举的例子来看，有些属于杂志上的社论甚至学术性的研究文章，作者也都一并归入到杂文里。另外，该文没有对《东方杂志》上的杂文进行数理上的统计，因而显得较为空泛，即使是对思想倾向、艺术特色等的概括，也几乎可以适用到所有杂文中去，没有较强的针对性。

综上所述，关于《东方杂志》的研究成果虽然很多，研究范围也很广，但多是着眼于政治、思想、编辑、传播、历史、语言等角度，真正对《东方杂志》上的文学进行研究的人很少，研究力度还相当薄弱。正因此，一个对《东方杂志》上的文学进行整体性研究的课题就呼之欲出。《东方杂志》上的文学世界到底是一种什么状况？它与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关系如何？它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发展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这些问题在召唤着笔者去深入《东方杂志》的文学世界，考察《东方杂志》之于中国近现代文学的重要价值，以填补这一方面学术研究的不足。

三

本选题的研究思路是：由阅读《东方杂志》开始，以其中的文学文本为研究对象，通过认真的梳理、考察和辨析，探讨《东方杂志》与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关系以及它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发生、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

本选题不是首先预设一个理论框架，再去找一些材料作为例证，而是从阅读原始文献开始，仔细体察《东方杂志》的文化背景、办刊动机、编辑理念、文化追求等之于文学的影响，并将其构建的文学空间放置到中外文学交流和时代进程的坐标体系中，在期刊与社会、编辑与作者、文学与批评的互动中探究现代文学发生、发展、演变的轨迹，探究其对于中国近现代文学的作家群体、文体建构、文学生态的营造等方面所作的贡献。

本选题的研究方法首先是采用统计学和分类研究的方法，对《东方杂志》上有关文学的资料进行详细的归纳整理。其次是运用归纳和科学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材料进行整理、归纳、选择、分析，抽绎出一种共识或结论，从而揭示出《东方杂志》与现代文学的具有规律性的认识。在思维方法上，本选题强调整体观。即必须将《东方杂志》纳入中西文化交流和时代发展的纵横架构中进行动态的、综合的考察，惟其如此才能揭示出《东方杂志》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之间的关系。

在研究中我们将会用到“公共空间”这个概念。这一概念来源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它是指“我们的社会生活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①。这一概念的提出，原是为了在西方的政治公共权威领域之外，形成一种能够体现民主意愿的私人公众舆论空间，进而影响国家及社会的进程。对于近代中国来说，这种具有私人性的公共领域并不存在，但是新兴的现代报刊为失去仕途的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发表见解、干预社会的一块话语空间。这种公共话语空间的形成是因为现代出版工业的发达，由商业资本与新兴知识分子共同搭建，具有明显的不稳定性，而且因时代政治环境的不同而不断变化。《东方杂志》就是这样一个由商务印书馆出资创办、由文化人主持的“公共空间”。文学是这个“公共空间”的一部分，它在某种程度上服务于杂志这一公共空间的整体建构。因此，“公共空间”这一概念的引入有利于解释文学在《东方杂志》这一公共空间中的位置与功能，以及随着这一空间的演变，文学又经历着怎样的变化。

文学社会学为我们研究《东方杂志》提供了有效的方法和广阔的视野。在文学社会学看来，“凡文学事实都必须有作家、书籍和读者，或者说得更普通些，总有创作者、作品和大众这三个方面。于是，产生了一种交流圈；通过一架极其复杂的，兼有艺术、工艺及商业特点的传送器，把身份明确的（甚至往往是享有盛名的）一些人跟多少有点匿名的（且范围有限的）集体联结在一起。”^②也就是说，必须突破传统的文学等于作品的观念，将文学看成是一种社会系统中的“文学事实”，将其置于更广泛的社会流程中来考察，作者、作品、出版、发行以及社会政治事件、经济形势、文化运动等各种因素都可能对文学事实形成影响，因此，笔者的研究不只是紧盯在文学作品上，而是以作家作品为基本点，在文化、编辑、翻译、批评、社会历史事件等与文学有关的各种因素中，从大文学的宏观角度来研究《东方杂志》与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关系。

① [法]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汪晖译，《天涯》1999年第3期。

② [法] 罗·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于沛选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